

论《白牙》中流散族群内部的文化冲突

李英华

【摘要】扎迪·史密斯在《白牙》中着力表现的主题之一便是流散族群内部的文化冲突,这主要体现于流散者对待母国历史传统、宗教信仰等问题的不同态度上。他们以极端的方式追求单一身份,无视或刻意淡化其文化身份的复杂性,因此,在文化的传承过程中容易形成双向的文化隔膜。同时,文化霸权及其殖民主义的后遗症是引发族群内部成员间文化冲突的深层原因。而艾丽顺应英国多元文化的发展趋势,主动选择杂糅的文化身份,这既打破了单一文化身份的确定性,又解构了文化身份的二元对立,是消除族群内文化冲突的有益尝试。族群内部文化冲突的化解为消解英国的文化霸权或借由文化身份所体现出的后殖民问题提供了一种可能,也为族群之间文化摩擦的消弭提供了一种契机。

【关键词】文化冲突;流散族群内部;文化身份;文化杂糅

【作者简介】李英华,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在读博士,山东财经大学公共外语教学部副教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原文出处】《英美文学研究论丛》(沪),2021.35.79~87

【基金项目】本文为山东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重大项目“外国文学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愿景研究”(18RW-ZD04)的阶段性成果。

《白牙》(*White Teeth*, 2000)是英国女作家扎迪·史密斯(Zadie Smith, 1975-)的成名作,它奠定了史密斯在当今国际文坛的地位。得益于史密斯在此作品中所展现出的老练文风和历史、宗教、文化等社会现实问题的深刻思考,以及对英国多元文化的乐观包容态度,该小说先后赢得了英国橙子小说奖、英联邦作家奖、美国全国书评奖提名等多项荣誉。评论界普遍认为史密斯的这部作品继承且超越了前辈作家的现实主义风格,“流露出查尔斯·狄更斯和萨尔曼·拉什迪的神韵”(Tew 14)。

小说以写实的手法反映了近几十年来的英国社会问题,其着力表现的主题之一便是流散族群内部的文化冲突。史密斯主要聚焦两个英国移民家庭三代人在文化身份认同过程中的困境。由于流散者的特殊身份,他们不仅要面对来自主流文化的歧视,同时还因文化认同差异而对族群的历史传统和宗教信

仰表现出不同态度,进而引发了族群内部的文化冲突。这一文化冲突从表面上看是由战后移民潮引起的,实则是英国文化霸权及其殖民主义后遗症的深层次体现。

小说自问世以来引起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但目前国内外学者着重分析的是流散族群整体遭遇的政治问题或文化困境,在流散族群内文化冲突方面的研究尚显薄弱。为此,本文试图从三个方面对该问题加以解读:阐释族群内文化冲突的具体表现,即流散者在历史传统及宗教信仰方面的认同差异;从文化研究和后殖民的视角,深入剖析造成文化冲突的内在因素,同时,审视他们以文化杂糅的方式为消解文化隔阂所进行的不懈努力。在当今移民潮的背景下,文化身份危机以及由此引起的文化冲突日渐成为一个棘手的移民问题,本文聚焦在主流文化冲击下流散族群内部成员的身份焦虑、文化冲突和文

化调适,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族群内文化冲突的表现

随着社会历史发展,“流散族群”(diaspora)一词的内涵也不断丰富,由最初特指被迫背井离乡的犹太族群扩展至其他族裔的流散族群,并随着全球跨境移民现象的不断增多,而被用来指代不同的移民群体(李明欢 1—2)。自从流散族群踏上移入国的土地,源文化和移入国文化便构成双重在场,使得他们在构建文化身份时面临着两难的抉择。而且,即便在族群内部,流散者对历史传统、宗教信仰、阶级划分和性别身份等问题的认知也千差万别,族群内部的文化冲突也就难以避免。

小说《白牙》中族群内的文化冲突主要通过人物对历史记忆和宗教信仰的不同态度表现出来。历史记忆和宗教信仰是族群最鲜明的文化特征,也是族群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文化传统,它影响着族群内每个人的生活轨迹。从某种程度上说,个人对族群历史传统的态度也折射出他们对源文化的认同程度,是族群内成员之间有效沟通的前提。

正是由于对待族群历史传统的不同立场,小说中家庭成员之间矛盾重重,甚至连最亲密的父子、母女和兄弟关系也出现了难以化解的隔阂。萨马德和双胞胎儿子之间愈来愈深的代沟便是由此引发。萨马德是伊克巴尔家族在英国的第一代移民,可是 20 多年过去了,他仍然作为英国白人社会的“他者”存在,仿佛“丧家之犬一样”(史密斯 300)。这种无根之感反而增强了萨马德对源文化的归属感,促使他成为家族历史和民族文化的守护人。另一方面,他坚决拒绝被白人主流文化同化,这种类似“毒化”的“同化”是他深恶痛绝的。

与第一代移民相比,第二代移民面临着更严重的身份危机和更多的不确定性。对第二代移民而言,家族历史显然存在距离感,同时,他们还受到英国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因而他们不得不在源文化和主流文化的“双重纠缠”(double entanglements)(Arikan 1683)中反复重构自己的文化身份。由此可见,

流散族群内第一代和第二代移民在对待源文化和主流文化时,采取了不同的态度,造成两代人之间的文化隔阂难以消除,文化冲突时有发生。

萨马德和双胞胎儿子的矛盾则主要由文化冲突引起,这尤其体现在对待族群历史文化的分歧上。萨马德凡事都从守护文化的角度分析,当他发现孩子们的文化认同倾向偏离了源文化时,便决定送他们回孟加拉国学习传统文化,以此进行校正。他盘算着“文化通向一个人的根,是挽救灵魂的”(史密斯 142),可见他认定了“根”文化的重要性。8 年之后,父亲的愿望落空,父子间的矛盾更为激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留学孟加拉国的儿子决心学习英国法律,而留在身边的儿子却决定加入伊斯兰教极端组织,他们都未能正确地对待“根”文化。父子之间为此充斥着失望和不满,关系也随之陷入僵局。

小说中陷入僵局的还有鲍登一家,他们问题的症结主要涉及宗教信仰和历史记忆两方面。与伊克巴尔家的民族主义立场不同,鲍登家族的第一代移民在宗教信仰方面就意见相左。对克拉拉的母亲和外祖母来说,宗教信仰不仅是维系族群内部成员关系的纽带,也是族群性鲜明的特征之一。但是,克拉拉却把宗教教义当作愚弄人的胡话,并下定决心让自己远离根文化。为此,母女二人心生嫌隙,关系日渐疏远。

无根的状态令女儿艾丽在进行文化身份认同时陷入困境。克拉拉尽可能地隐藏自身的文化特质,很少给艾丽讲述家族历史,希望女儿能够顺利融入英国社会。可事与愿违,对族群历史一无所知的艾丽在文化上实际上处于一种无依无靠的状态,仿佛被白人文化和族群文化同时抛弃的弃儿。伴随着艾丽的身份认同危机,她对母亲的信任感也急剧降低,母女二人的隔阂也愈来愈深。

总之,族群内文化冲突在小说中主要体现在人物对待历史记忆和宗教信仰的不同态度上。由于流散族群的特殊性,流散者在文化认同过程中面临源

文化和移居国文化的双重在场,他们或选择守护历史以维护神圣的族群性,或试图隐藏历史以期融入主流文化。无论做何种选择,他们不是被迫处于社会边缘就是担心根文化消失,均无法达到流散者期盼的完美状态。此外,由于流散族群内父辈和子代对传统文化归属感的差异,以及主流社会政治文化因素的影响,族群内部成员文化身份认同的过程必然伴随着文化冲突,它是流散者在构建文化身份时进行文化适应的有益探索,也体现了当代社会多元文化之间既互相冲突又不断融合的趋势。

二、族群内文化冲突的原因

文化冲突指的是“不同文化之间、不同人们的文化之间的碰撞、对抗和交锋”(马广利 112),它往往是由人们对文化认同的差异而引起,表现为“人们对自我身份、角色的不同认知”(同上)。在小说中,流散者同时面对源文化和主流文化的双重冲击,文化认同不尽相同,他们或以民族主义者的姿态坚守民族文化,或舍弃文化之根而期望融入主流社会,抑或是转向混合身份的认同,因而或多或少地与其他族群产生了文化隔阂乃至摩擦。此外,即便是在同一族群内部,流散者对文化身份的理解,以及对文化领导权的争夺,也会影响族群内的文化生态平衡。

流散族群的历史传统具有特殊性,即连续性和断裂性并存,因此流散者对文化身份的认同常常陷于困境。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 1932—2014)认为有两个矢量影响流散族群文化身份的建构,一个是“相似性和连续性,另一个是差异和断裂”(转引自罗钢、刘象愚 208)。族群历史文化为流散者提供了稳固的根基,但由于空间位置的断裂,族群内部的文化出现断层,并以差异的形式呈现出来。所以流散者的文化身份是存在个体差异的同一。

在《白牙》中,萨马德不仅重视族群内部文化的连续性,还强调文化差异的存在,刻意保持清晰的文化边界,以致父子之间出现隔膜。为了让儿子亲身了解母国历史文化,萨马德不惜血本把他送回孟加

拉国。对整个族群来说这是某种回归,可对马吉德个人而言,这更像是放逐,因为母国对他来说更像异乡,被连根拔起的马吉德失去了个人文化的连续性,未能建立起与母国文化的联系,父子之间愈发难以互相理解。其次,萨马德近乎偏执地维护着下一代文化身份的纯洁性,这种做法很难适应社会发展的潮流。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起,英国政府开始推行所谓的多元文化模式,族群间的文化交流增加,文化边界变得相对模糊。流散者如果仍以极端态度审视族群内的文化差异,拒绝接受其他异质文化,文化冲突势必难免。再次,萨马德坚持单一文化身份的衡量标准,这种非此即彼的态度忽视了身份的复杂性和流动性。霍尔认为“应把身份视为一种‘生产’,这种生产总是处在一定的过程之中”(Hall 443)。在全球化大变局的时代,流散者的文化身份处在不断调整的状态,他们需要平衡自身文化和源文化、移入国文化以及其他族群文化的关系,有时还受到父辈文化价值观的影响,所以其文化身份的建构困难重重。

另一方面,从后殖民批评的视角来说,文化霸权是族群内文化冲突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 1891—1937)指出统治集团主要有两种方式行使文化霸权,一种是“强制”的方式,通过国家暴力机关实现权力主体的要求;另一种是以“同意”的方式,通过思想、价值观的不断渗透和同化获得人们发自内心地、自觉地赞同(转引自马广利 23—24)。与第一种方式相比,第二种方式更为温和,更为隐蔽,但是危害也更深远。

在《白牙》里,鲍登家族的第二代移民克拉拉不仅“同意”了英国社会的文化霸权,还在培育下一代时表现出霸道的一面。为了摆脱歧视和偏见,逃离流散者的边缘状态,克拉拉自觉自愿地“同意”臣服于这种文化霸权,心甘情愿地接受英国文化和价值观的熏陶。对文化霸权“同意”的举动对个人、对族群都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在英国白人眼里,这只不过是一种拙劣的文化模仿,他们仍是有瑕疵的仿制

品,依然无法融入主流文化。而对族群的文化传承来说,通过刻意的文化模仿,主流文化会占据流散者的精神世界,从而可能导致他们放弃本民族的文化传统。

克拉拉全盘西化的态度不仅不利于族群文化的传承,还加剧了族群内部的文化冲突。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在分析权力时认为“权力以网络的形式运作在这个网上,个人不仅流动着,而且他们总是既处于服从的地位又同时运用权力”(福柯28),每个人在纵横交错的权力网络里可能同时扮演不同的角色。在由文化领导权织就的网络里,克拉拉一方面臣服于主流文化,一方面又对本族群的文化采取消极的态度。她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均展现出民族虚无主义者的倾向,这种倾向不仅不利于成员间的交流,也不利于族群内部文化冲突的缓解。

因此,族群内部的文化冲突,主要与流散者文化身份认同问题相关联,流散者以极端的方式对待族群内部的文化传承而陷入困境,同时,流散者身份的建构不可避免地受到英国主流文化的形塑。霍尔把这种强制性的身份构成因素称之为“欧洲在场”,所以,英国的文化霸权和“欧洲在场”是造成族群内部文化冲突的深层次原因。要保持族群内的文化生态平衡,流散者应增强对族群文化的自信,紧靠族群文化之根,还要反抗各种形式的文化霸权。

三、族群内文化冲突的消解

由上述分析可知,在《白牙》中,族群内部文化冲突的根源在于流散者对文化身份认同的极端态度,他们在极端民族主义者和民族虚无主义者两种倾向之间游移不定,缺乏对流散者文化身份审时度势的思考。二战以后,英国社会多民族、多元文化并存,族群间文化交流、融合日益频繁,文化杂糅已形成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因此,流散者要顺应时代潮流,利用自身的文化特质,积极构建多重文化身份,族群成员间也要更为包容,这些都有利于化解族群内的文化冲突,也有助于族群之间的和谐共处。

汉斯·冯·阿姆斯特福特(Hans van Amersfoort)曾分析过流散族群在与主流文化融合时达到的一种理想状态,那就是“异乡如家”(at home abroad),即他们既融入主流社会又保持民族文化相对独立,文化身份呈现出一种混杂的状态(Amersfoort 364)。小说中,艾丽的做法便是对此种理想状态的尝试,她植根于源文化,又融合了主流社会的文化要素,从而达到了一种文化融合的平衡状态。

“杂糅”(hybridity)是小说中反复出现的意象,而这一意象通过艾丽集中地体现出来。首先,从血统上看,她是黑、白人种混血的结果。其次,从文化身份认同方面看,她不断重新定位自己的文化身份,反复进行文化杂糅的尝试,经历了由盲从到自省的蜕变。艾丽最初期望通过改变体貌特征融入主流文化,失败之后,逐渐接受了杂糅的思想。同时,她意识到必须立足于源文化,才能摆脱“无家”的状态。她接纳一切有益于自身发展的文化要素,构建起多元化的、杂糅的文化身份。另外,从族群文化传承方面看,艾丽对文化身份多元性、混杂性的最具象征意味的尝试莫过于肚子里身份模糊的孩子,不管孩子的生父是哪一个人,孩子都无法摆脱来自父系的伊克巴尔家族的孟加拉基因,也会与夏尔芬家族产生割舍不断的联系。这就是艾丽对多元身份的不断建构,她根据不同的人文环境选择不同的身份角色以适应外界的文化环境,而非完全同化或完全拒绝的截然对立的态度,既立足于族群文化,又充分吸收外在有益的文化元素。

艾丽的文化认同方式具有“模拟”(mimicry)的特征。霍米·巴巴(Homi K. Bhabha, 1949-)详细阐释了“模拟”及其相关问题。第一,模拟不是简单的模仿,目的是产生与“被模拟者相似与不似之间的‘他者’,以打破殖民话语的秩序”(汪民安200)。艾丽在建构文化身份的最初阶段,也对主流文化进行过拙劣地模仿,可是这种模仿根本无法增加她的认同感,反而是带有自身差异的文化认同增强了她的自信心。这种“像而不是”的不确定性成为反抗主流意识形态的

一种策略,也是消解族群内全盘西化倾向的一种手段。同时,艾丽对族群文化的传承也并非简单地照搬祖辈的传统,所以“模拟”达到的居间状态在文化传承时也有助于缓解民族主义者的偏执倾向。

第二,混杂性与模拟相关,霍米·巴巴强调了混杂性的颠覆意义,它打破了文化身份的纯一性,也消除了后殖民话语中对文化的等级划分。在吸收多元文化的过程中,艾丽发觉族群文化和主流文化的边界日渐模糊,这种模糊的边界不断重新定义着中心,瓦解着自我/他者,白人文化/非主流文化的二元对立,甚至改写着“英国性”。既然文化的混杂性无孔不入,那么族群中全盘西化者的立场便站不住脚了。

评论家们认为史密斯试图以杂糅的方式解决文化冲突是小说的积极意义所在。多米尼克·黑德(Dominic Head, 1962-)将《白牙》和其他多元文化小说相比较,指出“当拉什迪(Salman Rushdie, 1947-)和其他作家都为融合和同化忧心忡忡的时候,史密斯却把文化融合视为卓有成效的,双向的过程加以呈现”(Head 111)。史密斯通过艾丽的人物塑造传递着她对流散者身份建构的信心。

总之,艾丽是小说中文化杂糅的代言人,她在守护文化之根的同时又充分吸收其他族群有益元素的做法,以及不屈不挠又兼容并包的态度,都是缓解族群内文化冲突的有效途径。而且,无论是从模拟“像而不是”的视角还是从混杂性理论的角度分析,艾丽的文化身份认同观念,打破了单一文化身份的确定性,瓦解了文化中心主义,解构了文化身份的二元对立,体现了文化杂糅的消解力量。文化隔阂的消除势必有利于族群内成员之间的交流和族群内文化生态的平衡。

结语

毫无疑问,《白牙》是一部充满现实关怀的小说。它以20世纪后半期伦敦的多元文化社会为背景,聚焦流散族群内三代人近20年的生活状况,系统地展现了流散族群因受主流文化冲击而产生的身份

危机和族群内部的文化冲突。21世纪以来,曾为《白牙》所描绘的场景在现实世界中不断复现,英国乃至欧洲的移民问题愈演愈烈,族群之间以及族群内部的冲突时有发生,而此类摩擦大多可以归结于文化认同的差异。由此,杂糅的文化身份有助于族群内部成员的和谐共处,而族群内部文化冲突的消弭不仅为化解英国的帝国文化霸权或借由流散者的文化身份困境所体现出的后殖民问题提供了一种可能,同时也为族群之间文化龃龉的妥善处置提供了一种契机。

参考文献:

- [1]Amersfoort, Hans van. "Gabriel Sheffer and the Diaspora Experience." *Diaspora: A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Studies* 3 (2004): 359-373.
- [2]Arikan, Seda. "'History' and 'Roots' in Zadie Smith's *White Teeth*." *Journal of Academic Social Science Studies* 2 (2013): 1679-1696.
- [3]Hall, Stuart. "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 *Contemporary Sociological Thought: Themes and Theories*. Ed. Sean P. Hier. Toronto: Canadian Scholars' Press Inc., 2005. 443-453.
- [4]Head, Dominic. "Zadie Smith's *White Teeth*: Multiculturalism for the Millennium." *Contemporary British Fic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3. 106-119.
- [5]Tew, Philip. *New British Fiction: Zadie Smith*.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 [6]李明欢:“Diaspora: 定义、分化、聚合与重构”,《世界民族》,2010年第5期,第1—2页。
- [7]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 [8]马广利:“文化霸权—后殖民批评策略研究”,苏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
- [9]米歇尔·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 [10]汪民安编:《文化研究关键词》,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
- [11]扎迪·史密斯:《白牙》,周丹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8年。